

澳華新文苑

第1101期

氣象塔尖的飛鳥

冬日高遠的天空藍得怪異
 鐵崗人工湖半島更鼓嶺上
 亞洲最高的氣象塔孤立无语
 塔身一截紅一截白捉著青山
 一群候鳥和留鳥盤旋塔尖
 呼应綠林议论瘦高的塔影

大雁南來你要氣象塔散佈什麼消息
 鴻鵠越冬你捎來北歐的童話和神話
 常住老鷹你有什麼志趣需要塔尖傳遞
 森林裡百餘種鳥兒偷窺氣象塔心事

氣象塔你是否回應了鳥們的奇怪提問
 你是否對大氣層有新異的心灵感應
 湖裡魚兒和微生物是否表達氣象變化
 自然預警地球暖化你能否先知先覺
 海洋風暴來年可否撞痛你小蠻腰
 不確定哦不確定真的不確定

我也跟隨鳥們撒弄氣象塔是非

金山銀山

章含秋

以金山的巖巖視托天空的高度
 以銀山的寬廣見證大地的遼闊
 以一顆虔誠的心敬畏自然
 以一束陽光的成熟熱愛所有生命

如果可以
 我把理想的高度與金山比肩
 如果可能
 我把夢想的世界與銀山唱和

王鑽清詩二首

掌中手机被铁的磁場掐死心机
 那诡异的元宇宙胎死手机腹中
 虚拟世界也有跨洋的魔王吸血鬼
 快从元宇宙把自由的风还给森林
 森林托举氣象塔道问流云星河

探测暗物質的卫星暗訪太空時暗示
 宇宙中有大量暗物質高达百分之九十
 他們深情暗戀普通物質不離不弃
 比如暗物質用球體包圍銀河系
 可是他們包不住飲食男女之心

假如我是一匹駿馬
 就披金山踏平
 假如我是愚公
 就搬銀山搬走

暗物質之旅

假如人間正道是滄桑
 我就化身夢想愚公
 騎著理想的駿馬
 奔馳在狹路相逢勇者勝的大地上

假如我是一匹駿馬
 就披金山踏平
 假如我是愚公
 就搬銀山搬走

留給世界的
 一定是勝者為王的無限風景
 回眸一笑
 百媚生

於是借用虫洞这种快速时空旅行的通道
 顺着时空弯曲穿行两个不同的遥远空间
 前往二百五十万光年之外的仙女座星系

我們周身活躍著云团式暗物質粒子
 万物有灵有心接受他們的友情親密
 穿过身体 順便穿过地球和星際
 你手捧暗物質 它會从手心漏出
 漏出數千萬個老子却不生兒子
 總有一顆暗物質粒子
 与你身體元子核撞出情債
 暗物質那微弱信號
 叫我們無法偷窺或透視
 可是他或她的引力把普通物質吸附到一起
 万物就有了外表和內里 就有了精神
 引力把我們人類定格在物种消長的大地
 地外生命和所有天體一樣都會自然消失
 假如沒有引力那人就是宇宙中一個星塵
 我們就在太空流浪 流浪 無奈又無力
 跟地球一樣在宇宙中流浪 流浪中發現
 所有的可能性在暗物質之旅中訪問自己

假如我是一匹駿馬
 就披金山踏平
 假如我是愚公
 就搬銀山搬走

假如人間正道是滄桑
 我就化身夢想愚公
 騎著理想的駿馬
 奔馳在狹路相逢勇者勝的大地上

暗物質之旅

假如我是一匹駿馬
 就披金山踏平
 假如我是愚公
 就搬銀山搬走

假如人間正道是滄桑
 我就化身夢想愚公
 騎著理想的駿馬
 奔馳在狹路相逢勇者勝的大地上

留給世界的
 一定是勝者為王的無限風景
 回眸一笑
 百媚生

▲凌永雄世界攝影十傑作品《金銀山》

大時空詩：新時代詩歌的美學突圍

——王鑽清大時空詩集《敲響自然的骨頭》漫評 莊偉傑

打開王鑽清新出版的詩集《敲響自然的骨頭》，一種新異感、奇特感、震撼感，仿佛從無限的時空中撲面而來，強烈地撞擊著內宇宙；或如一道奇異的光，穿越大時空直擊在額頭上，讓我的視線迷離在詩集繽紛亮閃的一幕幕“大設計”中。在筆者目力所及的海內外漢語詩歌界，可以斷言，這部大時空詩集的橫空出世，是這個時代的詩歌在精神轉向和美學突圍上產生的一種奇跡，是“一個智慧而強大的存在”。我這樣說，尚不溢美。可能有人會提出質疑，甚至認為是過於高估。感興趣的讀者朋友，只要進入文本空間，一起在“穿越大時空”（第一輯）的旅行中，跟著詩人去去略精心營造的“夢幻大時空”（第二輯），就能在會意中“共享大時空”（第三輯），從而感知、理解和體悟其中的藝術奧妙與特殊的美學價值，甚或贊嘆詩人從大歷史中走來的那種“思接千載，視通萬里”的多維時空感。

這是作者繼詩集《大時空詩》（中國文聯出版社2016年版）推出之後的再出發。縱覽這部共分三輯、由近130首詩作結成的詩集，起碼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幾大亮點。

首先，作品皆是漸趨定型，且構成自足系統的“大時空詩”。或寫出了時空一體化、時間的空間性和空間的時間性，或呈現出時空的無限大或無限小。所有想像的情景、人事、風物，都鋪呈在無限時空的畫卷上。如《對時間的沉思》《穿越時空的心》《從大歷史走來》《大設計》《暗物質之旅》《黃金眼或星鏡》《飛天的詭秘》等詩篇。

其次，詩人以敏銳的心靈視線進入靈魂的大時空。在處理星球、天體運行、太空和外太空等特殊材料時，如何讓這些缺乏詩意的東西轉化成詩呢？作者大膽而巧妙地進行多方面的嘗試實踐，有“深度想像實驗，有漢語的詞語活用，有語詞與語詞搭配的實驗，有科幻手段的運用，有個人情緒和個人氣息，有抽像現實，有個人體生命體驗與人類性的關係有機處理，還有有機語言與新概念的交配等等”。所有這些，皆以“心靈視線”作為認識和打開宇宙奧秘的“一種輔助線”。一句話，詩人試圖“創造一種新的詩歌結構”，以期成為一種新的詩歌範式可能。

再者，整部詩集風格上大小情勢共振

呼應。打開目錄，從第一首到最後一首《生命密碼》，詩人的心扉都是“直通宇宙深處”。足以感受到詩人目光所及之處，“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鋪天地宇宙為一面紙，化神秘世界為千萬點，大千星宇，萬事萬物，忽大忽小，時上時下，空間不空，時間不息。“自由的靈與多重宇宙的我同行”（《孤獨的老鷹》）。最後，詩人通過大時空尋求一種智慧的發聲方式，即靈魂話語的建構方式。“一邊建立自己與時間幻想，空間探測，抽像現實、人類未來等相關的題材體系，一邊建立與大時空、人類性、現代性等諸多因子緊密聯繫且富有個性的語言體系——科幻的、詩性的、哲思的、神性的、靈異的、奇幻的、混沌的語言體系”（唐小林語）。

時代在流變，歲月在流轉。一個誠心的詩人，要走出一條與眾不同的詩歌藝術之路，並非一蹴而就。王鑽清果敢地尋找自己的寫作資源和對接靈魂出品的通道，這種探險式的“旅行”與他的個人史有關嗎？作為60後詩人，科班出身的王鑽清，大學畢業後從湖北的荊楚大地奔赴改革開放的現代大都市深圳開闢，有過記者、編輯、公務員、創業者、旅遊達人等多種經歷，在現實生活中伴隨時代脈搏同頻共振，一路逐夢遠航。然而，當他以一個詩人的姿態出現時，他並不滿足當下詩歌所面臨的窘境。對他來說，召喚內心多彩的感受，尋找新路徑的拓展，才是自己寫作的應有之義。因此，進入新世紀（2005）以來，他在深圳一直嘗試寫作“大時空詩”（又稱科學詩），並總是在尋找表達的突圍。他覺得傳統的技法和自己內心豐富的體驗相比，存在著某種程度的衝突。其間有些烙印，從《敲響自然的骨頭》這部詩集裡可以窺見一二。最初詩人只是借用天體、星系、太空、外太空等空間物理和天體物理學來說現實現象，如《世界是水》《航海家的發現》《太空機械舞步》《觀月全食》等；中間期的作品如《黑森林》《一個人的地球夢》《哲學家的目光在星系空間被點亮》等，更多的是把天體新觀念及太空新發現等融入感性的詩中，或製造詩的新語境。經過一番艱苦奮鬥和內在修煉，詩人厚積薄發，並且坦言，真正走向成熟或成型的大時空詩，是在2016年之後。

在特定的時代語境中，一個詩人一旦發現自己的寫作面臨挑戰，無法更好地施展自己的詩歌抱負來表達生命的訴求，傳達靈魂的聲音，其表徵的是精神上遇到難題，即難以突破自己，難以讓寫作邁上一個更高的台階。比如，感官視野是否需要進一步調整或打開，內在的精神建構是否需要轉向或擴展？以此喚醒並激發自我詩歌世界的生機

盎然。誠然，要進行有效的突圍，除了進入“有難度”寫作狀態外，關鍵是如何實現詩歌的精神轉流，在詩歌寫作理念與寫作形式上不斷取得新的突破。於是，經過反復探索和權衡，心中有數的王鑽清緊緊抓住“大時空詩”展開突圍，意欲在幾個主要層面自覺踐履，在《後記》中他是這樣概括的：一是尋求語言突破的可能性；二是拓展詩歌題材新領域；三是探索詩歌革新之路徑；把大時空視為靈魂，把詩性、詩情和詩思交融運行作為基本點。

正因如此，在後期的詩作中，詩人以精神的衝蕩之氣驅動和染醒了矚目的詩篇。例如，在《氣象塔尖的飛鳥》《暗物質之旅》等作品裡，給人帶來的啟示是多樣的。

其一，是詩歌敘述的豐富性頗為濃烈。詩人在文字裡不斷釋放出一種瀟灑恣肆的情懷。而這種瀟灑性，是美醜難分，是非難分且虛虛實實交織成一體的。“我們周身活躍著雲團式暗物質粒子/ 萬物有靈有心接受他們的友情親密/ 有數千萬個暗物質粒子跟你沒商量/ 穿過身體 順便穿過地球和星際/ 你手捧暗物質 它會從手心漏出/ 漏出數千萬個老子却不生兒子/ 總有一顆暗物質粒子/ 與你身體元子核撞出情債”

其二，從字裡行間可見作者以類似宣敘調的方式徐徐行進，語言的密集度因錯落有致而獲得了多聲部詠嘆的美學效應。在這裡，詩人一反以往中國詩人只會對景物進行確切性的勾勒，而忽視了對存在的怪異與不確定性的呈現。王鑽清試圖召回這些東西，他知曉那些存在的價值，在展開“暗物質之旅”的過程中，“順著時空彎曲穿行兩個不同的遙遠空間”。（未完）

送別詩的高考示範作文——說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史雙元

在盛唐即將來臨的歷史時刻，一對好朋友，也是命運共同體的好朋友，帶著些微的悲傷，受時代宏大氣勢的烘托，將一場公務員調任的悲傷離別釀成了感動千古的壯行。

杜少府是王勃的朋友，受王命調遣，從京城長安調任蜀州（今四川崇州）任縣級地方官。“少府”，是唐朝對縣尉的通稱。相比唐朝長安城的繁華與政治地位，這應該是一次類似於支援邊遠地區的安排。

從一線城市調往三線城市，杜先生免不了會有些失落與傷感，作為同事和朋友，在送別的聯誼活動上，王勃或受組織委託，或自告奮勇做了一個主題發言，表示了自己對同事遠行的依依不捨，但重點是鼓勵年輕人要眼界遠大，看好前程！

唐代文人的發言基本是以詩歌來完成，這首詩的兩句豪言壯語成了流傳千古的送行壯語，無論是大學生畢業還是好朋友調動，我們首先想到的題詞就是這兩句。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這兩句是寫景，由近而遠，從目前景物延伸到遠方山河。“城”古代主要指城牆，“闕”指宮闕。“城闕”，是首領的標誌性建築，指唐朝帝都長安城。“三秦”，指長安附近的關中一帶。秦末項羽曾把這一帶分為三國，所以後世稱它三秦之地。“輔”，輔佐，護衛。開頭寫送別的地點，略去其他景物，

推送出“城闕”二字，突顯帝都的雄偉和氣勢，再輔之以開放闊大的三秦之地，一下子就把送行的“排場”放大了，好像整個長安和關中都在為朋友送行。

“風煙望五津”。“五津”指四川省岷江的五個渡口，代指四川蜀州。遠遠望去，但見四川一帶風煙茫茫無際，這自然是想像中的景物。這一句說的是杜少府要去的處所。因為朋友要從長安遠赴四川，這兩個八竿子打不著的地方就在感情上自然發生了聯繫。詩的開頭不說離別，只描畫出這兩個地方的形勢和風貌，牽掛與祝福就自然在其中了。上一句眼見為實，下一句想像為虛，遠近交替，虛實結合，對仗也很工整。

“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畢竟是送別，免不了有傷感。這兩句扣題目的“送”字。

“與君離別意”，“與”字是動詞，“與”不能作為連詞或介詞看，否則，句子就不通了。“與”的本意是“黨與”“同類”，引申為同感、呼應。“與君離別意”的意思是，你我同類人，你的痛我懂。為什麼說是同類呢，下一句是解釋：“同是宦遊人”。宦，也就官的意思，官宦一體，宦遊人就是接受調遣、流動性很強的公職人員。客居京師，同是離鄉背井之人，這已經含有一重傷感；彼此在客居中又要離別，這是第二重傷

感。這兩句好像用詞平淡，但平淡後面包含的人情體貼和官場心理，卻值得細細玩味。

首先，要擺正身份，“同是宦遊人”，就要赴王命、聽調遣，這是從思想上與大唐政府保持一致的高度來排解個人情緒，並以此安慰對方。但這句話還有另一層安慰作用。少府是縣一級的官員，職位不高，但好歹算是走仕途的人，屬於公務員系列。在古代，多少人窮經皓首，不就是为了學而優則仕，混個官銜嗎。“宦遊人”三個字，舉重若輕，不經意中有意思，也只有同道中人才能領會。

但好朋友杜少府去遠在蜀地的縣級單位任職，確實不算差，因為唐代已經有“京師向心力”這個潛規則。什麼意思呢？就是大家都想到京城做官。你想想，在下面，州縣一級的機構，得熬一輩子，熬死一大批人，才能拿到個“尉”“丞”之類的職位，聽起來是“局級幹部”，這也就等於京城的科級幹部啊。唐朝的長安還是世界第一大都會，萬國衣冠，一百零八個小區，大型的超市就有兩個，還有專門為有錢人和當官的開的西域風格的葡萄酒酒吧，有胡姬勸酒，瀟灑之人李白就經常光顧。

這麼一想，離開京師確實是很傷心的事，怎麼安慰朋友呢，有什麼大詞能傷心朋友呢？怎樣來提高眼界，開闊心胸，從

離別的憂傷走出來呢？因此就逼出了下面兩句，也就是流傳千古的名句。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比鄰的“比”不是“比如”，“比鄰”是一個詞，“比”是形容詞，靠得很近的意思，“比鄰”的意思是近鄰。隋之前，中華大地戰亂頻仍，初唐，不僅進入了南北統一，疆域開闊，而且即將進入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盛世，詩人作為時代最敏感的報春者，感受到了三秦大地的暖意，因此筆下很自然地融進了初唐氣象。這兩句氣勢磅礴與大，筆健意豪；天涯和詩意在遠方，也就在伸手可及的地方，你都是青年，已經步入官場，友誼與詩意同在，前途與國運在一起，我們不憂傷。

話已經說到這裡了，豪情壯志也已經抒發了，接下來，還是回歸到送行這個主題。

“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無為”：無須、不必。“歧路”：岔路。古人送行常在在大路分岔處告別。“沾巾”：淚水沾濕衣巾。說“無為”，也就是不必，但也說明已經傷感了，忍不住傷感了，“共”字巧妙，不僅你傷心，我也傷心，寫的是傷感，表達的是理解和友誼。這是對朋友的叮嚀，也是自己情懷的吐露。

這首詩張弛有致，高高舉起，緩緩結束，抒情到位，說理含蓄，確實是一首送別詩的高考示範範作。

保衛文學：從夏志清評張愛玲兩部作品談起

何與懷

實了，實現得太快了。

沈睿認為，《秧歌》是一部偉大的政治小說。這部小說揭露了正在形成的中國極權制度是怎樣破壞了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的根基，毀滅了中國人與人之間的根本關係，描繪了中國農民以及普通人民在這個制度中的無權無勢的地位。這部小說，也許比中國迄今為止發表的任何小說都更深入和微妙地揭露中國極權統治的本質。這在任何意義上都是令人震驚的。這本書出版於1955年，在餓死三千八百萬人的大饑荒還沒有開始，在毀滅了中國的基本道德的文化革命還沒有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十多年之前，卻成為現實的中國社會巨大悲劇的識語。

關於一部小說成為一個時代的預言，沈睿做了一個比較。她認為，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除了《紅樓夢》之外，還沒有一部書可以像《秧歌》一樣做到這點。也可以比較另一部偉大的政治小說《1984》。這部英國作家喬治·

多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這部小說描繪的中國傳統人倫關係、道德關係的破壞做了如此真實的關注。什麼是藝術的力量？沈睿說：“《秧歌》這本書證實了藝術的穿透力和偉大的政治小說的力量。把這本書放在人類的政治小說歷史上看，這部書是中國作家張愛玲對人類政治小說的偉大貢獻。”

2009年，任職上海同濟大學的中國文化批評家朱大可教授寫出《張愛玲的華袍及其虱子》。朱大可以他特有的風格，批評“小資迷途”對張愛玲的“嚴重誤解”。指出他/她們拒絕面對的嚴厲現實，是張愛玲的自我背叛——從華美的袍子裡，找出成群結隊的虱子。1952年以後，張愛玲躍出都市小資的限定，甚至拋棄《小艾》式的歌德主義實踐，投身於更為深刻的鄉村經驗之中，去書寫獨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開政治社稷的艱難道路。

朱大可早年是悉尼科技大學馮崇義教授的博士生，其批判眼光相當敏銳，相當獨到。他的文章最初在《南方都市報》發表時，有兩段被審查官員斷然刪去，而這兩段正是朱大可的最重要的真知卓見：

《赤地之戀》和《秧歌》，無疑是中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兩座高峰，它們以平淡和反諷的風格，探尋“土改”的真相，為這場末元璋式的權力運動祛魅，揭示它幕後的悲劇意義——人性的扭曲、謊言的囂張，工作組幹部的卑劣、知識分子的墮落、“地主”的無辜，

以及底層農民的貧困與苦難。“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是的，五年以後，一場更大規模的災難急降臨，導致了無數“鄉下人”的非正常死亡。

革命故事、鄉村故事、底層故事、女性故事、飢餓故事和戰爭故事，所有這些故事母題都被疊加起來，在威權體制的袍上，喊出反烏托邦的細弱聲音。在中國現代史上，沒有任何一個作家像張愛玲那樣，以鴉片雞眼的洞察力，完成了對“鄉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戀》相比，描述江南鄉村社會的《秧歌》顯得更為精妙，儼然是前者的升級版。那些反諷性的殺豬細節、以及縱火、死亡和秧歌場景，都是社稷文學的經典片段。它是一支華夏民族的哀歌，傳遞出農民經久不息的苦難。

我當然認為，朱大可把《赤地之戀》和《秧歌》“無疑”地判定為“中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兩座高峰”，無疑是非常正確的。

還有很關鍵的一點。張愛玲“自我背叛”，走上“打開政治社稷的艱難道路”，其重大意義，的確必須在張愛玲研究中給以足夠的重視和探討，並得到肯定和稱贊。張愛玲是“潤”（run）的先鋒，想想1952年是什麼時候？那個時候，中共奪得政權不久，“美好的新中國”宣傳鋪天蓋地，一時間似乎也非常深入人心。那些留在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有回國的學有所成美英等國華裔學人，都沉浸在“當家作主”的幸福之中，渴望一展宏圖。而張愛玲悄悄地走了，“帶著她照片上用的那張莫名的幾乎是悲傷的微笑”。正如艾曉明在上文引用的她的1998年文章中所說，張愛玲不僅在她的小說中寫出了那種“更令人絕望的恐怖”，她更身體力行對其作出了果斷的反應。當五十年代排山倒海的“新生活”浪潮追來時，張愛玲選擇了逃離，迅速地逃離。猶如在大地震前受到異兆而逃生的小鼠。艾曉明指出：張愛玲保持了一個小說家對自己的忠實，《秧歌》可以說是理解她後半生的一把鑰匙，鑒於人與藝術如此的沉淪，她的逃離是無從返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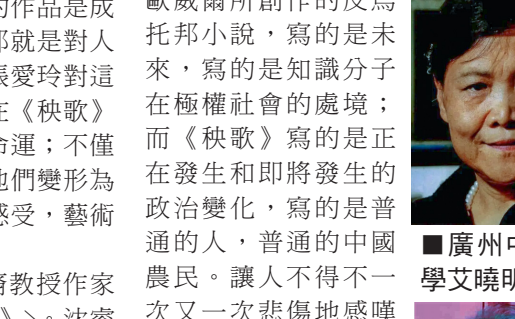
是，歷史在這裡沉思：如果張愛玲不走，她又將是何種命運？如果她不走，她又何以能夠寫出《秧歌》和《赤地之戀》這兩部堪稱“中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兩座高峰”的偉大作品呢？（未完）

四，《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後已經過了幾十年，期間發生了許多政治歷史大事件，足以發人深省，人們得以作多方面的更深入的觀察與研究，形成了不少新觀點，對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評價更高。

（接上期）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英文原著於1961年出版，最初的中文譯本於1979年出版，至今已經過了幾十年，期間發生了許多政治歷史大事件，足以發人深省，人們得以作多方面的更深入的觀察與研究，形成了不少新觀點，對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評價更高。

例如，在1998年1月9日出版的第354期《華夏文壇》上，廣州中山大學艾曉明教授發表題為《亂世悲歌——關於張愛玲的〈秧歌〉》的評論。艾曉明說，在《秧歌》中，張愛玲以這樣兩條線索——一個農民的死去、一個劇本的誕生，表達了她對動盪時代的思索，那是古老的恐怖和恐怖的喜劇。艾曉明以“突破”兩字贊揚《秧歌》。張愛玲曾以為她寫不了這種更廣大的題材，所以這部作品可視為她的一個裡程碑，相對她前期的作品是成功的突破（當然與前期也有保持一致的地方，那就是對人類的愚行和瘋狂的沉思）。艾曉明特別指出，張愛玲對這個時代錯誤完整的揭示，那就是良知的死亡。在《秧歌》中，被表現的不僅是農民的命運，還有藝術的命運；不僅是為農民作傳，也是為知識分子照相，照出了他們變形為小醜和弄臣的嘴臉。知識分子放棄了對真實的感受，藝術變成粉飾，這才是更令人絕望的恐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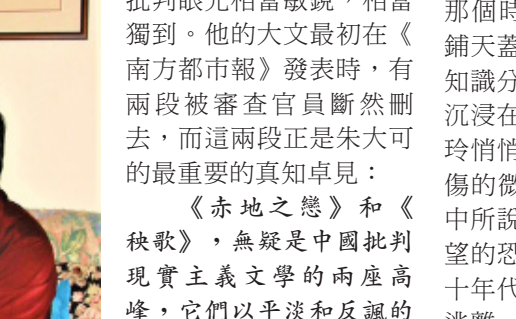
2012年，《中國南方藝術》發表美國華裔教授作家沈睿撰写的《偉大的政治小說：張愛玲的〈秧歌〉》。沈睿這篇原於2008年刊登在《今天》的文章，強調《秧歌》的偉大的“預言”意義。她說，張愛玲寫作本書時，她既沒有意圖也沒有來源去預言將會到來的恐怖，但是以某種下意識的方式，她的小說預先講述了不久就強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殘酷的荒謬的現實。張愛玲不是職業的中國觀察家，但是，根據她的物質的常識性的看法，她看到了內在的靈兆。《秧歌》裡面的故事，證明她的預言簡直是太真



▲廣州中山大學艾曉明教授



▲美國華裔教授作家沈睿



▲朱大可（右）在導師馮崇義教授家裡（2002年11月17日，本文作者攝）。

